

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拳拳救國心

安徽省抗敵後援會各縣流動工作隊回憶錄

中共安慶市委黨史辦公室編

拳 拳 救 国 心

——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回忆录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主 编： 赵荣声

副主编： 李银德

王长夫

拳 拳 救 国 心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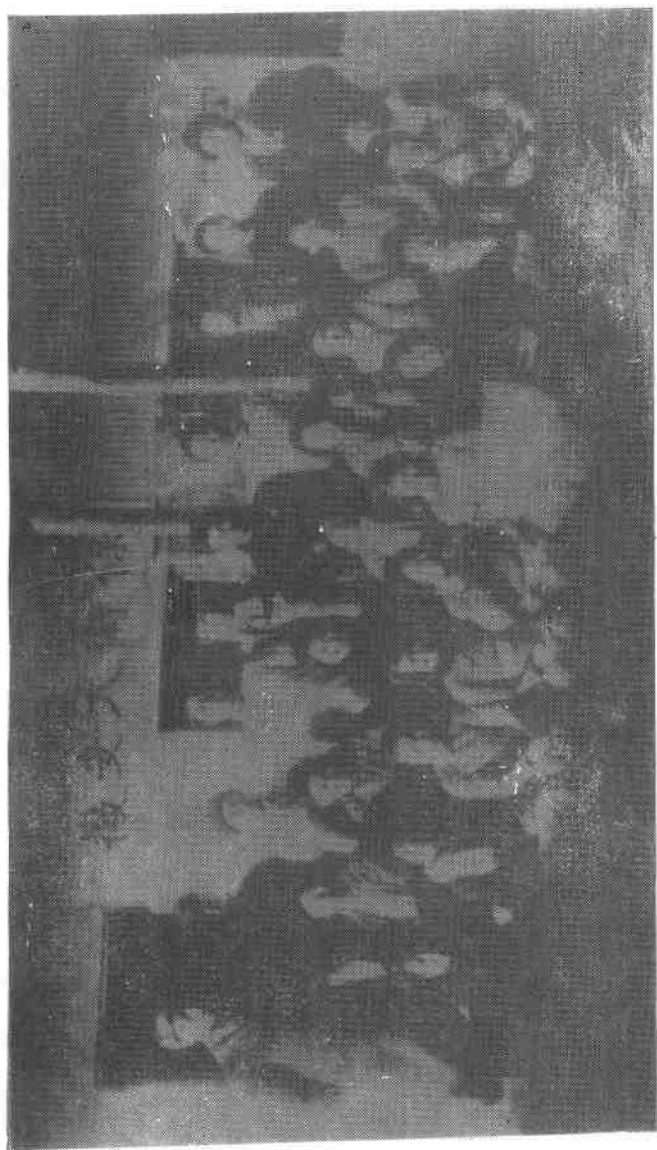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庆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字数：10万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2000册

ISBN7—212—00619—X/K·162 定价：1.80元



图为流动队出发前合影

前排由左至右:	孙其珠	都志圣	杨训炯	陈琼	史春芳	赵荣文	吴啸林	王伯渊	刘大禹
中排由左至右:	唐朋	程铃	刘芳	马文英	刘鄂华	王治中	刘慈元	乐治权	
后排由左至右:	鲍光华	后文瀚	方琦德	王振宝	朱世裘	刘世模	孙家澄		马训生

刘复彭

序

1937年，在安庆组建的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他们最先在安庆和皖西山区播下抗日救亡种子，并且锻炼成长了一批干部。

各县流动工作队的成员，都是爱国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大学生。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大片国土沦丧，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起来，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从城市到农村，深入集镇、村庄、农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发动全民抗战。他们这种热爱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思想作风，表现了我国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我相信当代知识青年，将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张劲夫

1990年8月27日

I

126711

目 录

序.....	张劲夫 (1)
皖西忆旧.....	后奕斋 (1)
一段难忘的经历	
——回忆抗战初期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	
.....	王 榕 (14)
回忆安庆抗日救亡活动和各县流动工作队.....	马 彬 (32)
我和“流动队”.....	刘 芳 (37)
走向革命的起点.....	张开政 王昭铨 (50)
回忆中梅河办报.....	霍之奎 (55)
一曲青春之歌.....	唐 朋 (60)
轶闻数则.....	杨洵石 (63)
零星而深刻的回忆.....	马守一 (67)
革命队伍最亲热.....	孙 琚 (70)
“鸟儿出笼”——忆从家庭出走参加革命的片断	
.....	李伯中 (74)
我心目中的大哥大姐们.....	陈 踪 (77)
革命从这里起步.....	成克坚 (83)
大别山的冬天和春天——回忆各县流动工作队.....	方璠德 (90)
深沉的怀念——忆方璠德.....	何 均 方璠德 方 纯 (96)
缅怀王亦工烈士.....	李伯中 (104)
回忆弟弟王亦工.....	王 榕 (116)
悼流动队员马训生同志.....	唐 朋 (120)
编 后.....	(121)

皖西忆旧

后奕奇

(一)

安庆原为安徽省的省会。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这里先后出现过“结义强盗”、“造反秀才”以及形形色色正面和反面的人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安庆成为反革命围剿的战场，安庆的城头高挂过血淋淋的人头。1931年安庆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后，除了流散在群众中的个别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中共党的有组织的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一些原籍安徽而在北京、上海、南京读书的大中学生回乡，又把抗日救亡的革命火种带回安庆。他们很多人都亲身受到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锻炼，有的已经参加了“民先”，个别的已经入了党，经过他们一鼓动，又把安庆搞热闹起来了。

桐城人方琦德、方珂德是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琦德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太湖人赵荣声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他们三人是中共党员，在安庆都有家。琦德、珂德根据1937年9月中旬在南京成立的中共南京市委的委托，在10月到安庆、桐城一带发展党的组织，荣声则是顺路回家探亲的。琦德根据南京市委的指示，在安庆分别解决了刘复彭（刘丹）和我的党组织关系。

我们三人分析了当时安庆的形势。事实上比我们先回到安庆的一些同志，已经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串联活动，安庆有了一些救亡宣传工作的基础。我们认为，如果进一步组织不同形式的读书小组，到近郊农村宣传抗日，大唱救亡歌曲，公演话剧和街头抗日活报剧，经常组织召集青年学生时事座谈会等，可以把在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控制下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引向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从党的活动方面来说，也就有了一个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有利形式。于是我们三个人进行了分工：琦德负责党的组织领导，复彭负责上层联络和争取合法斗争的工作，我负责以读书小组为主要形式的内部教育如时事座谈、政治学习等。记得我们还组织过救亡报告会，请过境的文化人作救亡报告，刘季平曾以满力涛的化名为我们作过救亡演说。

在争取合法斗争方面，安庆仅有国民党省党部挂了一个安徽省抗敌后援会的招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抗日活动。我们经过研究，由复彭出面通过一些社会上层关系，用省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建立一个“各县流动工作队”。我们打算把串联起来的青年救亡骨干拉到皖西大别山去，因为我们初步了解到党组织在那里留下了红军游击队。这时国民党省党部日常工作负责人是书记长胡摩尼。胡是湖北人，他既要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又不能无视广大群众要求抗日救亡的形势，于是不放过利用青年人为他装点抗日门面的机会，派省党部的科长王秀春同复彭谈了几次。最后他们同意给我们“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番号，但是经费给养要我们自筹，他们还要派一名队长来负责带队，复彭担任副队长。

在救亡小组内部教育方面，我们在读书小组逐步形成、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通过革命书刊、救亡小册子的相互交流，学习座谈，使原来有一些革命

思想的同志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初步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加深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认识。二是开展关于救亡图存、中国只有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才有出路的时事讨论，并把这种讨论和我们的救亡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思想认识上的提高，那么后者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自我教育的同时，我们在读书救亡小组中征集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救亡小册子、进步书刊等。如《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海上述林》和一些通俗的读物《大众哲学》、《游击战争》、《政治经济学》、《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在争取合法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在基本骨干中说清楚对官方派来的队长要提高政治警惕，并把所有准备入队的人编成小组，而且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

安庆城内的救亡活动和党的工作先后进行了两个多月。

在两个多月的救亡活动中，起着突出作用的是王伯渊（王裕）和鲍光华。王伯渊是安庆安徽省一女中1936年的学生会主席，在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回到安庆，对女中同学参加救亡活动有较大的吸引力。鲍光华是芜湖的名门子弟，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他对工作极端认真，在宣传活动中的技术性工作，都由他负责，实干精神很强，对流动队成立前后的宣传工作起着主要作用。在组织流动队五个发起人（方琦德、刘复彭、王伯渊、鲍光华和我）中，王伯渊和鲍光华联系群众的面是比较广的。

（二）

在流动队出发之前，我们把可以拉走的人集中到赵荣文（荣声的胞妹，原在南京读中学，参加过南京学生救亡运动）家里，即安庆东门内天台里赵宅。大家着重整理了要带走的革命书

刊和通过不同渠道募筹来的无线电收音机、油印机及演话剧、街头剧的道具，搞宣传用的笔墨、纸张、颜料和常用药品，弄来了几辆装东西的木质独轮车。这时，琦德、复彭和我正式成立了“流动队”的中共党团，由琦德任书记，复彭和我为党团成员，此后三个人的秘密碰头就是党团会了。

在赵宅集中时，我们举行了以救亡为职业的宣誓活动，并在“保卫大安徽”的大型横幅下拍下了照片。

国民党派来的队长郭云是安徽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原在安大的同学和外地来安大借读的都不认识他。党团认真地从侧面对郭云作了了解，原来他是国民党CC分子胡摩尼的湖北同乡，过去参加过社会活动，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他的具体情况和反革命身份则无法进一步搞清楚。当时认为郭云能在大动乱中直接受胡摩尼指使而来，一定是来者不善。开始代表省抗敌后援会同我们公开洽谈的是安庆北门外小学校长黄纶书，后来郭云出面和我们接触时，我们感到他还是一个比较有政治经验的对手。当郭云准备介绍一位安大农学院同学程铨入队时，又有一个叫刘世模的临时要求入队，郭云便接纳他入队，并委派他为队里的秘书，我们一看不对头，恐怕他们还要派人来，便与郭云协商，并在全队队员大会上通过决议，以后若再有人要求入队，须经两个队员介绍，并在全队大会上通过。接着大家又选举刘慈元为副队长，方琦德为秘书，鲍光华（武汉大学学生）为工作股长，负责宣传工作，王伯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为生活股长，负责日常伙食供应和财务，我为教育股长，负责自我教育和学习。这样由队长、副队长、股长、秘书组成队务会议，讨论决定全队的各项活动，限制了队长郭云个人的权力。

这时日寇已占领上海，进逼南京，飞机经常到安庆狂轰滥炸，伤兵从前线撤下来无人护理医治，过境的军队、难民异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流动队共计三十多人冒着寒风，如期于十

二月九日拂晓前赶到北门外整队出发。记得家在安庆而随队出发的有马文英（马守一的姐姐，安庆一女中学生）、刘芳（安大毕业生，留校任化学系助教）、吴霖林（吴容，复彭的爱人）以及复彭的弟弟大禹和妹妹鄂华，还有马训生（战争时期最早牺牲的一位）、金声玉（省立一中学生），并有不少人为我们放鞭炮送行。就这样，流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有的还推着、拉着几辆独轮车离开安庆，当天走了60里，在高河埠休息。许多人脚上起了水泡，特别是一些年幼的女队员受到了考验。但是，抗日救国的高昂激情战胜了初次行军生活的困难。第二天流动队在新安渡宿营，第三天就到了桐城县。马守一是随后从高河乡下赶上流动队的。

桐城在安徽既是一个人口众多、文风鼎盛、官宦辈出、封建影响渊远流长的地方，也是我党较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县份之一。早在大革命前后，桐城就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城区和四乡很多知识青年表现了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并且激励了若干上层人士的爱国热情。这时进步的知名文人、曾经留美多年的女教授方令孺也回到她的故乡，她见到我们这么多大学生下乡宣传抗日，给予了热情鼓励。方是庆的母亲、琦德的姑母。我们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以县城为中心，召开各界人士抗日座谈会，广泛宣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抗日大获胜利的消息，并用自备的收音机、油印机出版油印小报，及时传播消息。这震动全县，增强了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同时运用歌咏、漫画、戏剧、街头演说等形式，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重要性。我们还把对内部的自我教育和对各界人士的救亡宣传结合起来，比如当时县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桐城人），对我们的工作，不但没有设置障碍，而且请我们参加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从而使我们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宣传在全县公开化、合法化、广泛化，也使人民群众了解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十大主张，在实际上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卖国行为和对共产党的诬蔑。

“流动队”在桐城的活动时间只有十多天。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和日常生活经费，也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由南京向武汉转移，我们没有吸收队员和发展党员；但是，在加强队内团结、进行自我革命教育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时虽然也有另外的抗日宣传团体经过桐城，但影响较大的还是我们这支“流动队”。

大约在12月下旬我们离开桐城，沿着安合公路，经过大关、小关等地进入舒城县境。这时日寇已经攻占芜湖、南京，并在南京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上海和长江下游各地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一部分机关人员、知识分子纷纷向内地转移逃难，安庆的国民党省级机关也纷纷沿安合公路向皖西六安迁逃。我们则按照预定的计划，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皖西山区进发。

(三)

离开桐城县境，我们首先到达安合公路边的舒城县沟二口宿营。这里是皖西大别山东部余脉的边缘。“流动队”党团这时对全国、全省的政治、军事形势，并不具体了解，仅从收音机中知道一些动态，特别是华北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屡创日寇，威震全国，最为我们所关注。对于我们所要找的大别山红军游击队，在这里我们作抗战宣传活动时，曾经访问过附近的群众，见到几位身穿破衣的农民，带着两枝破旧的长枪，不像是地主武装。我和他们见面时，只了解到他们是本地人，既问不清他们负责人是谁，又查不清他们的来龙去脉。我同琦德、复彭密谈了这一情况，认为皖西山区有可能存在我党游击队的活动，但在同党的上级组织没有接上关系以前，我们无法直接同零星游击武装取得工作上的配合，而且更不符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这个情况对我们党

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却震动了队长郭云，他曾露出暗藏的手枪，使许多队员大为紧张。同志们一面要我提高警惕，一面对我采取了保护措施。

我们在沟二口宣传两天就到了舒城县城。在舒城，我们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进一步了解到一些本地的救亡活动情况。舒城县抗敌后援会中有少数本地活动分子是抗战爆发后回乡的知识青年，其中有的已去陕北学习，也有个别中共党员是回乡探亲的。同我们队员一度在大学或中学里的同学就更多了。他们有的在国民党县政府当科长，有的在县保安大队当分队长，在市镇当联保主任的更不乏其人。我们充分运用这些关系到南港、桃溪等地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流动队”有一位队员不记得名字了，南方人，他是学美术的，画了一幅朱德总司令和蒋介石握手的巨型画像，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群众对国共合作极为兴奋，听到我们生动地宣传华北红军改番号为八路军后大量歼灭日寇的消息万分激动，但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恼火，舒城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没收了这幅画，我们立即向他们提出抗议。正好胡摩尼由安庆逃往六安时途经舒城，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展开合法斗争，逼着郭云出面取回了这幅画。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利用我们而又害怕我们的矛盾心理，以及当时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混乱局面。

这时从上海、南京前线退到舒城的抗日团体很多，有文的也有武的，逃难的群众就更多了。以盛子瑾为司令的“别动队”约有几百人也退到舒城，原在上海的文化人柳乃夫等参加了这支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我的初中同学金声华，他和我于1936年在上海一起参加共青团活动。这时他估计我可能帮助他解决党的关系，我告诉他只有去武汉才有办法。在舒城，有位金陵大学学生李绶宝，家住芜湖，由于队员中家住芜湖的很多，加之这时芜湖已经沦陷，大家欢迎李绶宝参加了我们的流动队。

根据党团活动计划，我们于1938年1月底集中到舒城的大镇中梅河过春节。在中梅河，我们开展了宣传活动和自我教育。在队内，我们还组织大家就经过那条路线去六安开展讨论。大家决定经毛坦厂过霍山，去六安，以避免途中拥挤。在中梅河度春节时，大家尽情地开展了联欢活动，由于队里许多人已同家庭失去联系，特别是一些芜湖人高唱起流亡三部曲，激起全体队员的无限乡思！大家提出一定要保卫大安徽！

（四）

大约在2月中旬，我们离开中梅河，在九井一带休息后离开舒城县境，到达六安县的毛坦厂。毛坦厂位于舒城霍山之间而远离六安县城，四山环抱，丘陵起伏，镇内房屋、商店和碉堡栉比。我们到的时候正是正月初十左右，住在一个没有开学的小学校里。我们在交涉就地进行宣传活动时，发现这里有实权的是地方武装商团，而且有些不正常现象，比如根本找不到本地的上层代表人物。当时党团暗地决定我和琦德先骑自行车沿山区大路赶到霍山县城，表面上作为“流动队”的先遣，实际上是准备早一点到霍山安排工作，复彭留队负责掌握队务。这时，郭云也感到情况有些异常，只好不闻不问。就在琦德和我骑自行车离开毛坦厂十多里路的时候，流动队突然遭到土匪的洗劫。当时我俩既担心流动队遭遇危险，又希望能逢凶化吉，心情十分沉重。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毛坦厂商团团长已事前同那批落草的散兵游勇有勾结，他们乘着正月十五元宵节各家各户多少有点食物过节的机会，开门揖盗，烧了几座碉堡，枪杀了几个护家的老百姓，抢走了大批衣物、食品和货物，并用彩轿把商团团长抬到山里入伙去了。后来，这一伙临时啸聚山林的好汉们也都瓦解了。事隔数十年之后，幸存的同志们对这件事都还记忆犹新。我们赶到霍山县

后，首先到县政府要求见县长。当时霍山县长还是前任安徽省主席、河南军阀刘镇华所派的一位河南人，他正在办理移交。我们到了县抗敌后援会，很快接洽好“流动队”住在县文庙，并了解到国民党桂系李宗仁已到六安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以及一些国内、省内一般政治、军事动态。

1938年2月中旬，劫后的流动队面临春寒料峭，饥寒交加，囊空如洗，衣被、日用品丧失殆尽的困境。这时候党团着重从安定全体队员的思想情绪入手，努力运用霍山苏区群众革命的优良传统，加强队员的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同时努力设法解决全队物质生活的急需。

1938年2月下旬，我们在霍山得到了章乃器参加桂系李宗仁在六安筹建安徽省政府的消息。我和章乃器于1936年在上海救国会的活动中有所接触。经过党团的研究，决定琦德和我骑自行车到六安去了解具体情况。我们到了六安，很快找到了章乃器的住处。我们和章谈话时张劲夫同志也在座，但一言未发。我们谈了一些关于“流动队”的情况。章乃器说，现在你们回到安徽是很及时的，他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我们带到霍山，面交桂系刚刚派去的霍山县长黄宾一，请他资助我们，还要我们尽快把“流动队”开到六安来。当琦德和我高兴地走出门后，张劲夫同志就跟上来暗暗地告诉我们，“流动队”党的组织关系，已经从武汉带来了，今后由他代表党组织领导我们的工作，具体问题等我们到六安后再说。琦德和我听了，高兴极了。

(五)

1938年3月初，我们全队由霍山移驻到六安城内的县文化馆。这是一组两层楼、两进深、一大间公用礼堂的房子。当时这里还住有江都文教会宣传团和其他几个外来的救亡宣传单位。大

家称这座房子为“救亡大楼”。

这时的“流动队”党团在党的领导方面，直接受张劲夫同志代表武汉长江局领导，不发生任何横的组织关系，他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建党对象的考察、了解。

当时，六安是安徽省会临时所在地，在这里我碰到和结识了许多抗日救亡人士和文化界的活跃分子，参加过多次在六安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这里的座谈会比起在安庆时参加的同类型座谈会，气氛完全不同，比如只要有人敢于大谈什么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就会立刻遭到与会人员的反驳，指出只有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抗战，才能救中国，否则“四民主义”也不行。

“流动队”到六安后，立即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参加过有十几个抗日救亡宣传团体的联合公演。“流动队”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是“小调剧”，它实际上是民间歌剧，采用符合广大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皖西一带流行的民间小调形式，充满了抗日救亡的内容，轰动了六安全城。

在六安，“流动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在六安已不存在，国民党桂系于3月5日在六安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挂名为主任委员（后来改由廖磊兼任）。“流动队”开始没有变更队名，只是挂上省动委会委托工作团的名称，由省动委会按规定供应我们的费用，并且吸收了少数新队员。第二，有部分队员请假回家探亲或去武汉看病了，未归队的有鲍光华、刘慈元、刘世模、史春芳、邓宛生、方珣德、崔之璠、杨训炯等。其中鲍光华后来到美国入了美国籍，八十年代病逝于海外。第三，郭云开枪事件记得发生在六安，许多幸存的同志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需要补充的是郭云开枪之后就逃到武汉去了，接着他又由武汉回到皖西寻找我们而不得要领，事隔多年，传说他早在建国前就被湖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人民所镇压。第四，党组织为了工作上的迫切需要，先后从“流动队”调

出党员骨干或成熟的建党对象分往皖西、皖东北，其中有方琦德、刘复彭、王伯渊、唐鹏、马训生、陈庆绦等。记得王伯渊走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在字典上翻出来一个“榕”字，从此，她就改名为王榕了。

我们在霍山休整和移驻到六安后，曾油印出版了两期装订成册的《流动队队报》。《队报》充满了革命激情，除分发给队员外，曾少量赠送给一些政治上极可靠的同志。当时在六安的李文宜老大姐，把这两期队报随身珍藏，经过多年的风雨奔波，解放初期她极动感情地交还了我们。十年浩劫前，中共霍山县委前来上海征集革命文物，我们献出了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想不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到霍山老区访问时，竟没有查到这一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献。

“流动队”经过以上大的变动，改成了省动委会直属工作团。但是大学生和建党对象还不少，因此给了我们两个工作团（即十九和二十工作团）的番号，党组织决定留我担任团长。

从“流动队”在安庆的筹建到改称省动委会直属工作团，先后不到半年时间，活动范围仅在皖西一隅之地。为什么这一短暂的经历使我们身历其境的人终身难忘呢？如今十多位幸存者的共同回答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哺育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指引着我们奔向胜利的明天！

（六）

1938年5月下旬，省动委会决定十九工作团开到潜山工作。我们遂绕道源潭铺等地，五月底到达潜山县城。沿途一些从安庆等地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川军，每人几乎都在脖子上挂着鸦片烟枪。我们远远地目睹他们的狼狈相，称他们是“双